

两晋之际的士族生态与幽冀形势

——以王浚为中心的考察

范兆飞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魏晋之际的党争继续存在于西晋社会,士族升降与党派分野息息相关。太原王浚家族是西晋党争的积极分子:有的王氏成员投靠贾充集团,有的则反之,呈现出分流的家族生态。《华芳墓志》丰富了以王浚为中心的士族网络的认识。王浚家族的政治动向是两晋之际士族生态的缩影:政治斗争的复杂多变决定士族生态的多元化。西晋末年以州郡为地理单元的士族交游圈呈现出分崩离析的样态。王浚都督幽冀诸军事的力量凭借与该地区各种族的居民结构密切相关,军事上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依靠鲜卑段部和乌桓人,对付羯人的兴起;所依靠的汉人力量则立足幽冀二州,整合资源。王浚的力量构成体现出血缘性和地缘性的双重特征。刘琨、王浚在经营北部中国方面存在异同,关于二人的史料记载体现出史家笔法有意增删的特征。刘琨、王浚经营北部中国的失败,标志着胡汉力量强弱消长的重大变迁。

[关键词]两晋之际 士族生态 幽冀形势 王浚 刘琨

[作者简介]范兆飞(1978—),男,山西省芮城县人,历史学博士,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魏晋隋唐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1)03-0138-09

西晋立国短促,无力解决内外交困的政治难题。关于西晋灭亡、东晋建国道路之形成,学界成果甚丰,其中田余庆精妙阐释两晋交替的力量传承以及东晋门阀政治得以生成的历史缘由。^①囿于新资料的匮乏和研究视域的固化,西晋末年的政治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依旧处于雾里看花的模糊状态。魏晋时期以州或郡为地域载体形成的士族交游网络,在西晋末年的乱局中分崩离析。选取影响时局的重要区域,考察国家崩溃之际地方势力的运行实态及其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影响,毫无疑问,可以从空间切面的维度有机整合相关资料,更为细致地勾勒当时的政治场景和社会画卷。魏晋时期玄学新风兴起于河南洛京地区,大河以北诸州如幽冀士人仍然坚守汉人

传统,崇尚经学,渊综广博,兼以地缘接近,风俗相似,在西晋渐趋消解的残局下,可视作一个地域共同体进行讨论。^②笔者曾经对永嘉乱后并州地区社会势力的流动变迁,进行中观维度的考察。^③兹不揣浅

① 田余庆:《释“王与马共天下”》,载《中国史研究》,1979(3),后收于《东晋门阀政治》,第1—3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② 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收于《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361—37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卢云:《汉晋文化地理》,第127页,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曾有学人将之视为一个地理单元进行讨论者,如牛润珍:《魏晋北朝幽冀诸州的移民与民族融合》,载《河北学刊》,1988(4);《魏晋北朝幽冀诸州要论》,载《河北学刊》,1990(1)。

③ 范兆飞:《永嘉乱后的并州局势——以刘琨刺并为中心》,载《学术月刊》,2008(3)。

陋,以西晋时期一流大姓王浚家族的政治动向为切入点,^①系统考察其家族之政治态度,进而重点剖析王浚都督幽冀二州的力量凭借,并以此与刘琨刺并的力量构成进行横向比较,力求剖析两晋之际北部中国地方势力的存在样态,由此深入理解永嘉乱后北部中国的社会变迁。

魏晋之际的士族升降,基本上是沿着党派纷争的路线得以进行。太原王氏从地方大姓上升为一流高门,军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②东汉时期的王柔、王泽兄弟是太原王氏的可靠始祖^③,王浚家族从王柔担任护匈奴中郎将开始,四代数人,都具备较为突出的军事才能。政权易代之际,军事才能注定是士族成员倾力培养的重要方面。汉魏晋皇权嬗代,士人心中的国家意识日趋淡薄,家族主义渐成气候,王浚之父王沈在曹马之争中临阵反戈,确立这个家族“佐命之勋”的显赫地位。魏晋时期以士大夫门户对立为主轴的党争在嬗代之后并未烟消云散,而是以斗争合作的复杂态势继续存在于西晋的政治肌体之内。西晋政坛两大力量的明争暗斗,基本上是以羊祜和贾充为核心而展开的。^④太原王氏诸成员亦积极参加西晋时期的党争活动。

现在以王浚家族为中心讨论西晋党争视野下的士族生态。中古历史研究的最大困境莫过于资料的相对匮乏,史传文献和石刻资料构成中古史研究的资料基石,汉末魏晋由于当时政策的影响,迄今为止出土的墓志石刻依然屈指可数。1965年7月在北京西郊发现的《华芳墓志》弥足珍贵,庶可补充文献记载之不足。^⑤西晋墓志平均高度为50厘米左右^⑥,该墓志却高达130厘米,宽57厘米,形制之大为迄今所见西晋墓志之冠,远远超过贾充妻郭槐、贾后乳母徐美人及晋武帝贵人左棻等女性贵胄的墓志尺寸。该墓志形体巨大,正是其时王浚在河北地区统治地位的生动体现。王浚三位夫人依次是济阴文氏、河东卫氏和平原华氏,其通婚对象的社会地位呈现出逐次升高之势,并且都位于王浚统治区域内部。^⑦《华芳墓志》显示华芳和王浚联姻的具体时间为太康八年(288年)。而王浚父王沈卒于泰始二年(266年)^⑧,其时王浚年十五,推定王浚生于嘉平三年(251年)。则王浚、华芳联姻时分别为三十七岁和十八岁,相差近二十岁。两人连理时,王浚父沈已卒,其

母赵氏生死未知。王浚在《华芳墓志》中声称,“太夫人在堂”,所谓的“太夫人”可能指王浚嫡母荀氏。年轻的华芳嫁给王浚时,其父业已故去。^⑨但其父华衍曾任侍御史,与王浚有同朝为僚的政治经历,任职也具有相似性。综合两家联姻的具体情况,基本可以推定:(一)两人联姻不是在其父的主持下进行的;(二)王浚母身份卑微,在王氏家族恐怕没有“主中馈”的资格,婚姻在王浚一方可能是自主完成;(三)王浚以近不惑之年联姻华氏,和颍川荀氏家族一样,都是钦羨平原华氏在洛京崇高的社会声望;(四)平原华氏联姻太原王氏的考虑,虽非其父作出的选择,但显然是其族人看重王浚的政治潜力。

颍川荀氏无疑是贾充的主要盟友。如果单从婚姻情况来看,平原华氏屡次拒绝和荀勖联姻,自然应该排除在贾充集团之外;王浚和华氏家族联姻,似乎应该列于贾充的敌对集团。细究当时的实情,我们发现,平原贵胄华歆曾孙恒为仓曹掾,恒父虞为贾充所亲敬,史书称“朋党纷然”。^⑩而华虞拒绝荀勖为子

① 关于太原王氏的研究,参见[日]守屋美都雄:《六朝门阀个案研究——太原王氏系谱考》,刊载于《法制史研究》(4),东京,日本出版协同株式会社,1951。

②⑦ 胡志佳:《西晋王浚家族的兴衰及其人际网络》,载《逢甲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3(7)。

③ [日]守屋美都雄:《六朝门阀个案研究——太原王氏系谱考》,第20—22页。

④ 徐高阮:《山涛论》,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1(1),1969。还可参见曹文柱:《西晋前期的党争与武帝的对策》,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5)。

⑤ 邵茗生:《晋王浚妻华芳墓志铭释文》,载《文物》,1966(2);胡志佳:《西晋王浚家族的兴衰及其人际网络》,第141—160页;拙撰:《西晋士族的婚姻网络与交游活动》,载《南都学坛》,2009(5)。

⑥ [日]福原啓郎:《西晋墓志的意义》,载《文史哲》,1993(3)。

⑧ 据《晋书·王沈传》载,王浚父沈,母赵氏,参见房玄龄等:《晋书》,第11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据《华芳墓志》拓片图一二,王浚之父的名字在“汶”、“沈”和“沉”三字之间,模糊不清。赵超释读为“汶”,墓志清理者及将之释读为“沉”,邵茗生从之。分别见于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12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北京市工作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西晋王浚妻华芳墓清理简报》,载《文物》,1965(12);邵茗生:《晋王浚妻华芳墓志铭释文》,载《文物》,1966(2)。按,揆之史传,应作“沈”。

⑨ 《三国志·魏志·华歆传》注引华峤《谱叙》载华歆有三子:表、博和周。表有三子,虞、峤和澹。虞有三子:昆、荟和恒。澹子轶。参见陈寿:《三国志》,第4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但《晋书·华表传》载华表有六子:虞、岑、峤、鉴、澹和简。《晋书》必有所据。据《华芳墓志》,华歆子炳,字伟明,与华表(字伟容)为同辈兄弟;炳子衍,字长胄,与虞(字长骏)为共祖兄弟;衍子酆、玠均为华芳兄长,与华昆俱为敬字辈共曾祖兄弟。

⑩ 《晋书·任恺传》,第1286页。

求婚于前,又拒贾充女婿韩寿为子求婚于后。荀、韩两人皆为贾充党徒,华虞此举,导致其在政治上受到明显受挫,先拒荀氏而免官,后拒贾氏未登台司。^①如果纯粹阅读史传,我们会轻易得出平原华氏不惜鱼死网破与贾充集团进行斗争的观点。但《华芳墓志》的相关信息凸显出土族家庭更为复杂的生态关系:华芳姊苕竟然在堂叔华虞拒绝联姻颍川荀勖的情况下嫁给其子荀泰章。据《晋书·荀勖传》,荀勖子组字大章,大章即为泰章,是平原华苕之夫。由此看来,平原华氏家族的两个房支在面临荀勖求婚之时意见相左:荀氏凭借显赫官位,势在必得,欲娶华氏,华表一支坚决拒婚,而华表弟炳一支却虚与委蛇,与之联姻。华芳父衍卒于太康六年(285年),荀勖卒于太康十年(289年),^②华衍嫁女荀氏,极有可能是迫于荀勖的政治压力。婚姻抉择影响华氏家族的政治仕途至为明显:华虞不顾仕途受阻的威胁,毅然两次拒婚,由此可见,西晋士族通婚的条件固然含有理性的因素,诸如存在门阀等级内婚制的现象^③、通婚与士族成员政治前途的博弈等,但还包括成员主观性的抉择,如士族礼法、文化因素和人物风貌的影响,等等。华芳姊妹分适王浚和荀组,王浚和荀勖家族未能匡正乱世,唐代史臣毁誉相参,但根本上持否定性的意见。华炳房支未能进入唐代史家的编纂视野,或许是华炳一支官爵不显的缘故,也有可能是史家嫌恶其族遇人不淑而刻意删减的笔法所致。

若将视野进一步拓宽,王浚族人王浑有重用平原华恒之经历,又礼请荀勖子组为从事中郎,并称赞其“交义贞洁,清识见称”。^④征诸前事,晋阳王浑在征吴过程中,功高位尊。然时人颇有不以为然者,《晋书·周处传》载:“及吴平,王浑登建邺宫酺酒,既酣,谓吴人曰:‘诸君亡国之余,得无戚乎?处对曰:‘汉末分崩,三国鼎立,魏灭于前,吴亡于后,亡国之戚,岂惟一人!浑有惭色。’太原王氏政治地位之烜赫,却难掩时人悠悠之口。周处的肆意批评,显然是针对王浑家族一度为曹魏政权所重用,王浑本人亦曾为曹爽掾吏,而在魏晋鼎革之际叛曹亲马之丑事。王沈因叛曹亲马而显耀于世,已如前述。由此可见,太原王氏似乎隶属于贾充集团。^⑤周处之讥刺王浑,极易让我们联想庾纯之嘲讽贾充。晋武帝泰始八年(272年),庾纯竟然在贾充举办的宴会上与之激烈冲突,责问贾充“高贵乡公何在?”贾充欲用武力囚禁庾

纯,庾纯依赖中护军羊琇和侍中王济的救护方才幸免。^⑥我们发现太原王济在这次冲突事件中,站在贾充的对立面,因此在次年一度被清出将相大臣的行列。由此可见,太原王浑家族父子二代已经出现分属不同阵营的情况。结合平原华氏和太原王氏的具体情况,足可想见其时家族成员选择归属党派之灵活随意。

太原王氏在西晋党争中的复杂态势,还可从齐王攸事件中窥见一斑。太康三年(282年)齐王攸出镇青州,不过是西晋诸王就国、移封出镇国策的硬性规定^⑦,却引发西晋高层的激烈争执,争执主要体现在博士和高官两大官僚层面。《晋书·庾纯传》记载了八位博士(太叔广、刘暕、缪蔚、郭颐、秦秀、傅珍以及庾纯父子)和尚书省(朱整等)在齐王攸问题上的争斗。王氏家族(包括王浑)在这个问题上选择对抗贾充集团的方针。《晋书·王浑传》载王浑谏书凡五百余言,切中肯綮,武帝不能采纳。同传载王浑子王济亦陈请,又使公主与甄德妻长广公主稽颡武帝,请留齐王攸。^⑧齐王攸之争的结果是齐王攸本人以三十六岁的盛年卒于太康四年(283年),支持他的官员多数受到降职、免官的处分甚至有忧郁而死者。^⑨太康三年(282年)王济即因忤旨由侍中(三品)左迁国

① 《晋书·华表传》,第1262页。

② 分别依据《华芳墓志》和《晋书·荀勖传》。

③ 薛瑞泽:《嬗变中的婚姻:魏晋南北朝婚姻型态研究》,第36—41页,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也有认为西晋士族婚姻未将门第列为首要条件者,参见李金河:《魏晋隋唐婚姻型态研究》,第47页,济南,齐鲁书社,2005。

④ 《晋书·荀勖传》,第1159页;虞世南:《北堂书钞》,第245页,北京,中国书店,1989。

⑤ 学人指出,王沈与羊祜、荀勖、裴秀、贾充等人结成共进共退的家族集团,参见胡志佳:《西晋王浚家族的兴衰及其人际网络》,第141—160页。按,胡氏的论断是基于婚姻资料得出的表象结论,失之简单。

⑥ 《晋书·庾纯传》,第1397—1398页。关于这起冲突,参见徐高阮:《山涛论》,第98—99页。

⑦ 唐长孺:《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123—1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⑧ 《世说新语·方正篇》注引《晋诸公赞》载:“齐王当出藩,而王济谏请无数,又累遣常山主与妇长广公主共入稽颡,陈乞留之”。李慈铭对此进行校订,以为王济妻为常山公主,长广公主夫为甄德。参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91—2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⑨ 齐王攸之死,笔者以为是晋武帝所为,参见《晋书·齐王攸传》、《晋书·五行志》。关于齐王攸事件的讨论,参见徐高阮:《山涛论》,第112—116页;仇鹿鸣:《咸宁二年与晋武帝时代的政治转折》,载《学术月刊》,2008(11)。

子祭酒(五品),后在齐王攸卒之次年复为侍中。^① 种种迹象,显示西晋党争氛围下士族生态之复杂多样。

二

王浚经营幽冀地区的力量凭借酝酿于三王举义、征讨赵王伦期间,发展壮大则是凭借对成都王司马颖的军事胜利。永康元年(300年),王浚都督幽州诸军事,但幽州民政大权却掌握在幽州刺史石勒之手;^② 永兴元年(304年),成都王颖以心腹和演代替石勒,企图一举铲除王浚势力。王浚在乌桓单于审登的合作下进行反击,剿灭成都王司马颖精心部署的和演势力,史家评价和演破灭对成都王颖的打击是:“演死而颖之势孤,遂以覆败。”^③ 王浚领幽州牧,从此实现了对幽州地区民政和军政的双重统治。^④ 光熙元年(306年),王浚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领幽州刺史,次年表封段务勿尘为辽西郡公,假大单于印绶,标志着他成为河北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永嘉四年(310年),王浚兼领冀州;之前丁绍领冀州所依靠的军事力量,似乎仅为州兵。^⑤ 王浚经营幽冀等河北地区长达十余年。建兴二年(314年)王浚兵败被杀,其心腹颖川枣嵩降附石勒,其间有一段关于王浚用人的谈话,史载,

石勒既克蓟城,问枣嵩曰:“幽州人士,谁最可者?”嵩曰:“燕国刘翰,德素长者。北平阳裕,干事之才。”勒曰:“若如君言,王公何以不任?”嵩曰:“王公由不能任,所以为明公擒也。”勒方任之,裕乃微服潜遁。^⑥

这段谈话的表面内容是,王浚不能拔擢幽州人士,以为己用,遂致覆亡;更深层的含义是指王浚不能充分整合幽冀北方诸州的社会资源,大族贤达散居乡野,对国家事务漠不关心,正是西晋末年永嘉乱后北方士望的群像特征。征诸史籍,枣嵩对王浚用人的评价有失实之处。以刘翰和阳裕而论,王浚并非“不能任”,而是有任用的迹象:《晋书·慕容皝载记》虽然记载,“刺史和演辟为主簿。王浚领州,转治中从事,忌而不能任”;《通鉴》却记载,“王浚从事中郎阳裕,耽之兄子也,逃奔令支,依段疾陆眷”。由此证明,枣嵩的话没有反映王浚用人的实情。据王浚本传:“刘琨大为刘聪所迫,诸避乱游士多归于浚。浚日以强盛,乃设坛告类,建立皇太子,备置众官。……时燕国霍原,北州名贤,浚以僭位事示之,原不答,浚遂害之。由是士人愤怒,内外无亲。”王浚杀霍

原事,《资治通鉴》系于愍帝建兴元年(313年)十一月,必有所据,但对于“避乱游士”归于王浚的时间,表述不明,仅仅记载为:“初,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抚,又政法不立,士民往往复去之。”^⑦《通鉴》将避乱游士归于王浚的时间笼统的记为“初”,是求稳之笔法。西晋末年,帝国失序,中原大地面临前所未有之变局,士庶经常性的迁徙,是战乱时代的移民常态。^⑧ 在这种背景下,士望庶民向王浚集团的人才输入是不分时间不分地域的,当然也因为王浚的经营策略,士民力量的大量输出也经常发生。因此,《通鉴》将王浚力量强弱转换的时间节点定为比较模糊的“初”,或许正是这种乱象的反映。

实际上,北部中国士望民众的迁徙是有规律的行为。就4世纪初叶北部地区士望的迁徙情况而言,共有两次较大的迁徙活动。第一次较大的迁徙活动是永嘉五年(311年)刘聪攻破西晋都城洛阳,刘蕃、卢志等投靠并州刘琨,史言“人士奔进者多归于琨”^⑨。同年,刘琨上表猗卢为代郡公,又遣族人刘希合众于中山,王浚所统幽州的代郡、上谷、广宁等地的民众争相归顺,多逾三万。王浚、刘琨本来俱为司马越在北方的战略部署,是司马越集团在北方的中坚力量。^⑩ 但刘琨领并州面临的最大的对手是刘渊军团,并州诸将大多随前任州牧司马腾东下,百姓亦随之就食,余户不满二万,决定刘琨在军事上只能依靠地缘较为接近的鲜卑拓跋部。魏晋时期正是鲜卑诸部的政治发育达到较高阶段、发生转折的关键时

① 万斯同:《晋将相大臣年表》,见《二十五史补编》,第33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

② 《晋书》、《晋方镇年表》均误为“石堪”,兹据墓志改定,参见《石勒墓志》、《石定墓志》,收于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15—17页。

③ 吴士鉴、刘承幹:《晋书斟注·王浚传》,第6页,吴兴刘氏嘉业堂刊,1928。

④ 关于都督与刺史之关系,参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卷中《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103—110页,台北,中研院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五,1963。

⑤ 《晋书·良吏·丁绍传》,第2337页。

⑥ 《晋书·慕容皝载记附阳裕传》,第2828页。

⑦ 司马光:《资治通鉴》“愍帝建兴元年”条,第27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

⑧ 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见《长水集》,第198—2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⑨ 《晋书·刘琨传》,第1681页。

⑩ 田余庆:《释“王与马共天下”》,见《东晋门阀政治》,第1—31页。

(续表)

期。^① 军事力量软弱但具备合法地位的并州刺史刘琨,与力量强大但无合法地位的拓跋部,形成互惠互利的共生环境。^② 永嘉四年(310年),刘琨与拓跋猗卢结为兄弟,表其为大单于,并以代郡封之为代公,这起表封事件正是对王浚表封段部鲜卑事件的回应,拓跋部因此和段部鲜卑一样获得西晋政府赋予的合法身份。但拓跋部与王浚集团的发展空间存在交叉之处,代郡首当其冲。其时代郡为幽州所领,而非并州所辖,刘琨以王浚统领的属地划给猗卢,同时迁五县民众于陔南,雁门一带颇有依附于王浚的乌桓人。乌桓和鲜卑虽有相同的语言、文化和习俗,但族源可能不同,更有各自不同的活动空间和社会利益。^③ 刘琨此举,从土地和人力等物质资源上削弱了王浚势力,进而垂涎冀州,引发与王浚的冀州之争,直接造成刘、王同盟关系的破裂。第二次较大的迁徙正是刘、王交恶所致,即王浚本传所言的“刘琨大为刘聪所迫,诸避乱游士多归于浚”,刘琨大为刘聪所迫,发生在永嘉六年(312年),是年七月晋阳陷于刘聪之手,刘琨在猗卢的相助下,驱走刘聪势力,据守阳曲。《晋书·王浚传》所言的时间节点应该正是此年。王浚经营幽州长达十四年之久,领冀州二年,在河北地区的惨淡经营,绝不会因为杀霍原一事导致其依靠力量旦夕之间就变得众叛亲离。因此,有必要将王浚经营幽冀地区的力量凭借,复原出来。今排检史籍,考订王浚都督河北诸军事的力量凭借,简表如下:

王浚凭借力量简表

姓名	里贯/族群 ^④	任职	关系	资料出处
薄盛	太原/乌桓	青州刺史	羁縻	《晋书·王浚附浚传》
崔懿	清河东武城	东夷校尉	姻亲	同上
大漂滑	鲜卑	亲晋王	联盟	同上
大屠瓮	鲜卑	亲晋王	联盟	同上
杜群	平原		部属	《资治通鉴·晋纪·愍帝建兴元年》
段疾陆眷	鲜卑		联盟	《晋书·王浚附浚传》
段末杯	鲜卑		联盟	同上
段文鸯	鲜卑		部属	同上
段务勿尘	东部鲜卑	辽西郡公	姻亲	同上
封俊	渤海蓟县	冀州主簿	部属	《资治通鉴·晋纪·怀帝永嘉五年》
封抽	渤海蓟县	幽州参军	部属	同上
高柔	渤海蓟县	司空掾	部属	《晋书·王浚附浚传》
韩咸		从事	部属	同上
郝袭	乌桓		联盟	《晋书·石勒载记》
何奈虎	匈奴	别将	部属	《古今姓氏书辩证》卷十二
胡矩		燕相	部属	《晋书·王浚附浚传》

姓名	里贯/族群	任职	关系	资料出处
胡毋翼	泰山		部属	《晋书·慕容廆载记》
华萑	平原高唐	太常	姻亲	《晋书·王沈附浚传》
渐裳	乌桓		联盟	《晋书·石勒载记》
靳市	乌桓		联盟	同上
渴末	乌桓	亲晋王	联盟	《晋书·王沈附浚传》
孔纂	鲁国		部属	《晋书·慕容廆载记》
李矩		河南尹	部属	《晋书·王沈附浚传》
李恽	并州	青州刺史	羁縻	同上
刘搏 ^⑤		北海太守	部属	同上
刘根		督护	部属	《晋书·河间王颙传》
刘翰	燕国	尚书	部属	《晋书·石勒载记》
刘既		勃海太守	部属	同上
刘亮		勃海太守	部属	《晋书·王沈附浚传》
刘胤	东莱掖县	勃海太守	部属	《晋书·刘胤传》
刘翔	平原		部属	《资治通鉴·晋纪十》
裴宪	河东闻喜	北中郎将	部属	《晋书·王沈附浚传》
祁弘	乌桓 ^⑥	别将	部属	同上
日律孙 ^⑦	拓跋	右贤王	联盟	同上
阮豹	陈留尉氏	中山太守	部属	同上
邵举	魏郡安阳	冀州刺史	部属	《晋书·石勒载记》
邵续	魏郡安阳	绥集将军	部属	《晋书·邵续传》
邵义	魏郡安阳	督护	部属	同上
审登	乌桓	单于	联盟	《晋书·王沈附浚传》
审广	乌桓		联盟	《晋书·石勒载记》
宋该	平原		部属	《资治通鉴·晋纪十》
苏恕延			姻亲	《晋书·王沈附浚传》
孙纬		督护	部属	同上
田徽	并州	兖州刺史	羁縻	同上
田矫	并州		部属	《晋书·石勒载记》

① 罗新:《论拓跋鲜卑之得名》,载《历史研究》,2006(6)。
 ② 范兆飞:《永嘉乱后的并州局势——以刘琨刺并为中心》,载《学术月刊》,2008(3)。
 ③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25—44、165—16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④ 里贯可考者,予以标出;族群为汉人者略之,为非汉族群者予以标出。
 ⑤ 《晋书·王沈附浚传》载,“前勃海太守刘亮、从子北海太守搏,司空掾高柔并切谏,浚怒,诛之”;《资治通鉴·晋纪·愍帝建兴元年》载,“前勃海太守刘亮、北海太守王搏”。按,北海太守是刘搏还是王搏,存疑。
 ⑥ 田余庆:《代北地区乌桓与拓跋的共生关系》,见《拓跋史探》,第127—12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⑦ 日律孙一人多名,周家禄认为,“当作日利孙”。见吴士鉴、刘承幹:《晋书附注·王浚传》,第8页;田余庆主张为六修,参考《代北地区乌桓与拓跋的共生关系》一文,收入《拓跋史探》,第156页。

(续表)

姓名	里贯/族群	任职	关系	资料出处
王斌/象		冀州刺史	部属	同上
王昌		督护	部属	《晋书·王沈附浚传》、 《晋书·段匹磾传》
王堪		车骑将军	部属	《晋书·石勒载记》
王申始		别将	部属	《晋书·怀帝纪》
王悌	燕国	长史	部属	《晋书·王沈附浚传》
荀绰	颍川颖阴	从事中郎	部属	《晋书·荀勖传》
荀藩	颍川颖阴	留台太尉	部属	《晋书·王沈附浚传》、 《晋书·荀勖传》
荀组	颍川颖阴	司隶校尉	部属	同上
阳裕	右北平无终	从事中郎		《资治通鉴·晋纪十一》
游畅	广平任县		部属	《资治通鉴·晋纪十》
游纶	广平任县	主簿	部属	《晋书·石勒载记》
游统	广平任县	司马	部属	《晋书·王沈附浚传》
枣嵩	颍川长社	尚书	姻亲	同上
张豺			部属	《晋书·石勒载记》
朱硕			部属	同上
朱左车	会稽		部属	《晋书·慕容廆载记》

兹依靠上表对王浚在河北地区的力量凭借进行剖析。毫无疑问,这个表格的人员构成和王浚的真实势力存在相当大的出入,笔者的搜检也可能存在遗漏之处,但必须指出,古史编纂过程中的“加减法”显然是传统史家对文献资料金淘沙拣的过程^①,该过程反映了传统史家对古史的认知、记忆和重构。这些记忆碎片的有机整合基本反映了王浚经营河北地区、整合社会资源、并以之对抗石勒军团的力量基础。王浚的力量凭借具备以下几种形态:联盟、羁縻、统属及姻亲关系。其中联盟关系存在于王浚和异族势力之间,羁縻则是王浚对待乞活等流民势力的方式。上表可考实者六十余人,其中鲜卑七人,乌桓八人,从王浚和成都王颖尤其和石勒互为攻守的过程来看,段式鲜卑、乌桓突骑正是王浚主要依赖及合作的军事联盟。在鲜卑和乌桓异族势力之外,王浚在非常时期不排除援引匈奴和拓跋人来对抗石勒军团,其中拓跋猗卢子日律孙正是在段部鲜卑背离王浚的情况下,成为王浚拉拢的合作伙伴。

王浚都督河北诸军事所吸收的汉人力量构成,颇为复杂。其中有司马斌在冀州的部分势力,转化为王浚的力量凭借,譬如曾经担任司马斌冀州督护的田徽之后成为王浚统辖的兖州刺史;其中也有司马腾的部属势力,如随司马腾自并陞东下的州将李恂、薄盛。其中田徽里贯不详,但他可能和李恂、薄

盛同为乞活,乞活势力和近乎乌合之众的一般流民大相异趣,其显著特征是部众团结组织坚整,并州乞活更是令晋末诸方势力纷纷侧目的流民集团。^②《希古楼金石萃编·晋袁君残碑》碑阴载有两列文字,列首分别为“□□”“故吏”的字样。袁氏为谁,墓文残剥,难以考知。而故吏一列皆是太原士望,显而易见,袁氏曾经担任太原郡的官吏。其故吏共计十四人,其中十三人姓名可以考知,其中就有薄兽。^③薄氏为居于太原的乌桓人,可证西晋地方用人并无种族畛域之见。大批乌桓人进入并州核心地区,或始自曹操迁三郡乌桓于晋阳时。^④其时活跃于河北地区的乞活皆为王浚所羁縻,而这股势力原为并州刺史司马腾的州将,即为西晋地方军的主要构成,其后由于司马腾身死邺城,转化为流民势力。其时尚且活跃的并州乞活势力尚有田甄、田兰,^⑤郭茂倩《乐府诗集》引《乐府广题》云:“并州大姓田兰、薄盛斩(汲桑)于平原,士女庆贺奔走道路而歌之。”由此看来,田徽和田甄、田兰很可能俱为并州大姓。司马腾卒后,并州乞活失去司马腾的政治靠山,遂依靠王浚假署的政治资本,以求生存发展;王浚未必能够全然控制河北地区的各种汉人力量,遂羁縻司马腾军事力量,因地制宜,假署官号,扩充实力。

王浚凭借力量中,部属凡四十五名,在人数上占三分之二强,实际作用虽然不一定和数量多寡成正比关系,但在史传中出现的王浚部属显然构成王浚都督河北诸军事的汉人基础。在可资探讨的汉族大姓中,郡望可考者三十一人,如勃海郡三人:封俊、封抽和高柔;平原郡三人:杜群、刘翔和宋该;颍川郡四人:荀藩、荀组、荀绰和枣嵩;魏郡三人:邵续、邵义和邵举;广平郡四人:张豺、游畅、游纶和游统;燕国二人:刘翰和王悌;另外,陈留、河东、会稽、鲁国、泰山、

① 关于《晋书》史源的讨论,参见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晋书”、“晋书二”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晋书唐人改修诸家尽废”条,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② 周一良:《乞活考》,见《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12—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③ 刘承幹:《希古楼金石萃编》,辑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石刻文献全编》,第471—47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④ 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第1—6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⑤ 《晋书·晋怀帝纪》,第117页;《资治通鉴》“怀帝光熙元年”条,第2724页。

右北平、清河诸郡各一人。这些汉族士人的郡望分布较为广泛,如果不计乡贯未详的人物情况,大致涉及十二郡的十八个家族。据《晋书·地理志》,勃海、平原、清河俱为冀州统领,燕国、右北平为幽州统领,广平、魏郡、河东为司州统领,鲁国、颍川为豫州统领。因此,我们可以轻易发现王浚依靠的汉人势力体现出地域性的特征:整体上处于分散态势,但又相对集中,这些士人相对集中地分布于三个地区:幽冀地区十人、司豫地区十二人、并州地区四人。三个地区合计二十六人,占全部汉人依靠力量的84%。在这三个地区中,司豫士人又占相当大的比重,成因大概有两条,一是司豫地区是西晋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士人荟萃,学术昌明,时有“豫州人士常半天下”之说^①二是王浚家族数代累积的人际网络与社会资源^②。幽冀地区和并州地区的人物也比较多,一方面是西晋地方行政用人的制度性规定,即州府僚佐本籍他籍兼用^③,同时立足于王浚家族的社会资本。

另外,王浚依靠的汉人势力还体现出血缘性的特征:其部属中姻亲和亲族是第一层势力圈,王浚家族的通婚状况大致通过《晋书》列传,尤其可以根据《华芳墓志》得以很大程度的还原,已如前述。值得一提的是,史传记载王浚“为自安计”,联姻鲜卑段部及苏恕延;^④墓志中提到的婚姻对象又多为史传所阙如:这种不约而同的史料增删正是唐代史家不同旨趣的表达和反映。汉人姻亲皆在王浚集团中举足轻重,清河大族崔愨担任东夷校尉,是左右东北亚国际秩序的关键人物;颍川枣嵩,是王浚经营河北地区的核心人物。在王浚汉人势力中,多有同族人物一起担任部属者,如勃海封俊、封抽俱为东夷校尉封释之子;刘亮、刘搏为叔侄关系;颍川荀藩、荀组同为荀勖之子,荀绰为荀勖孙;广平游纶和游统为兄弟,游畅亦属同族。太原王氏和颍川荀氏的关系非同一般,应当溯源于荀勖家族和王沈家族都党于贾充的政治经历;颍川荀氏在王浚府中举足轻重,自然在情理之中。勃海高氏从冀州迁往幽州,欲依托王浚求发展,其后因为王浚政令无恒,转依东夷校尉崔愨,正说明王浚笼络北州大族不力,但同时必须注意崔愨任东夷校尉正是王浚经营东北亚地区的人事动作。另外,王浚凭借的鲜卑段部和乌桓等异族势力也呈现出血缘性特征。

中原士望迁向东北地区的过程多是以刘琨集团或王浚集团为跳板,鉴于刘、王集团政治法度的朝令夕改以及军事战争的节节败退,刘、王集团的士人大

批涌向东北慕容政权或拓跋政权,进一步破坏北部中国胡汉力量对比之均衡。司马光评论王浚不能存抚士人云:“初,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抚,又政法不立,士民往往复去之。”^⑤司马光的评论和上引枣嵩的论断具有相合之处,结合上表,我们发现确实有部分士人如平原士望、宋该、杜群和刘翔,勃海封俊、封抽等都是先依靠王浚,然王浚不能存抚,士民旋即离去。但需要注意的是,查核《晋书·王浚传》,并无王浚“不能存抚士人”的描述,仅有“士人愤怨,内外无亲”之语;形成对照的是,稽考《晋书·刘琨传》,却有“善于怀抚而短于控御”的记载,《世说新语·尤悔篇》、邓粲《晋记》均有类似的记载。笔者怀疑《资治通鉴》对王浚的记载笔法是“嫁接”了历代史家对刘琨用人的印象。王浚所属士民群大体流向鲜卑慕容部,一消一长,兼以王浚不能联合诸方镇力量,晋末危局更是雪上加霜。

三

永嘉乱后,八王交攻,刘、石铁骑横行并冀等地,北方士庶出现三个迁徙方向,或衣冠南渡,或迁向东北,或举族构坞。西晋社会以郡或州为地域单元形成的士族交往圈分崩离析。王浚被石勒掩杀,刘琨败走并州,晋室在北方的部署势力基本上宣告瓦解,至若邵续、段匹磾等人犹能领幽冀诸州,但没有雄厚的力量凭借,亦无法统支持,覆亡指日可待。两晋交替之际的方镇人物,有轻有重,刘琨、王浚即为决定北方时局的关键人物,其倚重的社会势力和军事力量各自不同,却在手段和目的上异曲同工,都能够立足西晋行将崩溃的现实状况,坐镇一方,以夷制夷,整合社会。进言之,刘琨继承了前任司马腾刺并的经营策略,依靠处于上升期的拓跋族,对抗刘渊集团之匈奴人;王浚则是联合鲜卑族中的段部势力,对抗附翼刘渊集团的石勒势力。士族群体在国家政治出现巨大分裂的情况下,亦会相应地傍依于不同的政治势力呈现出参商分化的态势。就北部中国的并幽冀三州而言,汉末以降逐渐凝成的地域共同体,即以

① 卢云:《汉晋文化地理》,第124—135页。

② ;胡志佳:《西晋王浚家族的兴衰及其人际网络》,载《逢甲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3(7)。

③ 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373—403页。

④ 《晋书·王沈附浚传》,第1146页。

⑤ 《资治通鉴》“愨帝建兴元年”条,第2797页。

郡或州为地域载体形成的土族交游网络在西晋乱局的强烈刺激下呈现出崩坏之势。从刘琨和王浚经营北部中国力量凭借的实际情况分析,不唯同州同郡的土族共同体出现分裂,同一家族的不同房支也出现分裂之势。这是刘琨、王浚经营北部中国的相似之处。但就刘琨、王浚分别经营并州和幽冀二州的缘起、过程及影响来看,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为进一步了解两晋交替之际的北方局势,兹就刘琨、王浚督镇的情况试作比较。

其一,督镇缘起。刘琨、王浚二人之家族俱为西晋社会的巨姓强宗,两人皆有党于西晋权贵贾氏之经历,皆有认同司马越盟主地位之往事,皆有地位显赫的通婚之家,皆有雄厚可观的社会资本。但在督镇一方的缘由上,有所不同。王浚之政治起家,得力于其先祖附翼于贾氏集团的紧密关系。王浚因缘际会,在元康初与黄门孙虑秉持贾后密令,谋杀太子司马遹,其后因功封宁北将军、青州刺史,又能在宗室内乱中韬光养晦,积蓄力量,最终凭借对成都王司马颖的军事胜利,奠定其在幽州地区的统治地位。刘琨于光熙元年(306年)接替司马腾领并州刺史,迄于建兴四年(316年)被石勒攻陷并州,逃奔段匹磾,前后经营并州逾十年。刘琨之领并州,得力于其兄刘舆在司马越面前的强力推荐,以及刘琨与并州土族的良好关系。^①刘琨任北面之重,正是要应付并州匈奴人的严重威胁。刘琨任并州牧,是地方军政大权的和平过渡,与王浚通过武力攫取截然不同。

其二,力量凭借。刘琨、王浚都能立足本地区已有的社会资源,进行整合,就力量依靠而言,基本上都囿于本地汉人力量的大幅下降,^②采取以夷制夷、远交近攻的策略,利用辖境边缘的异族势力对付处于心脏地带的异族威胁。西晋时期并幽冀诸州的居民结构各自不同:并州汾河流域主要由匈奴人构成,而桑干河流域则有拓跋人的渗透;幽冀地区的情况是,右北平、渔阳和上谷一带是北侧的乌桓人与南侧的汉人之间的分水岭,鲜卑人则分布在稍北的区域。^③居民结构决定晋末方镇可资利用的人力资源,当然也决定他们联盟伙伴的选择,必然各有差异。刘琨经营并州的策略,基本延续前任司马腾的部署方针,尤其在联合代北拓跋势力的表现上更加深入;遣子为质以求信任,割地献疆以表忠款,封官加爵以示威望。王浚经营幽冀二州的方针,与前任没有任何延续性特征;王浚能够联合鲜卑突骑,主要是自身能动性的体现,王浚通过政治婚

姻的手段,嫁二女给鲜卑贵胄,表其为亲晋王,显示王浚较为灵活多变的经营策略。王浚的这种做法应当是师法东汉建安年间袁绍嫁家人女子予乌桓单于蹋顿、并矫制授予单于印绶的故智。王浚和刘琨对待异族的差异就在于王浚没有划割土地给鲜卑段部,永嘉四年(310年),刘琨以代郡拓跋猗卢为代公,并以陞北五县让之,至少有五十万拓跋人进驻此地;这直接改变桑干河流域多种部落杂居的居民结构,雁北一带由诸族错居变成以拓跋人为主的聚居区。这是王浚和刘琨交恶的诱因,根源却在于刘琨和王浚的冀州之争。在此之前,刘琨和王浚同属司马越集团的中坚分子,刘舆、刘琨兄弟与司马越争夺豫州兵败,俱奔河北,正是王浚“资以兵马”,并与刘琨通力合作,使司马越从温羨手中获得冀州刺史的位置,^④甚至在建兴元年(313年)仍有“幽、并二州勒卒三十万直造平阳”进行联合作战的军事部署。^⑤就两方镇的灭亡道路而言,王浚以童谣而杀北州名贤霍原,司马游统因赏罚通石勒;刘琨以猜忌杀令狐盛,长史李弘据并州叛刘琨,无疑是《晋书》记载二人“不能存抚”、“善于怀抚,而短于控御”的鲜活注脚。

其三,声名荣辱。王浚和刘琨作为西晋朝廷在北部中国极为重要的方镇部署,对北方胡汉社会的有机整合厥功甚伟,两人卒后声名各有荣辱沉浮,不同之处是刘琨在姻亲兼僚佐温峤等人的申理下,迅速恢复盛名;但王浚身后几乎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而是在身死六十余年后才得到“兴灭继绝”的待遇,其从子道素被封为博陵公。刘琨、王浚均有党于平阳贾氏之经历,刘琨最为人所诟病者即为“飞纓贾谧之馆”;而王浚则党于贾后,有屠杀太子司马遹的行径。但贾氏败亡后,刘琨与王浚暂时归属不同的宗室人物:刘琨从属于声称“为太子报仇”的赵王伦府;而王浚则为赵王伦对付的主要

① 范兆飞:《永嘉乱后的并州局势——以刘琨刺并为中心》,载《学术月刊》,2008(3)。

② 譬如,有的学者断定并州胡族的总人口数,要大于汉族人口,参见廖幼华:《晋末太原刘琨败亡之基本形势分析》,载《国立中正大学学报》,1994(1);罗新:《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的民族形势与社会整合》,第15页,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5。

③ [日]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418—426页,李凭等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

④ 《晋书·宗室传附司马越传》,第1101页。吴廷燮《晋方镇年表》“冀州刺史”条漏司马越,收于《二十五史补编》,第3431页。司马越领冀州,亦有逐冀州刺史李义而代之说,诸说辨析请参见《晋书附注·惠帝纪》,第25页。

⑤ 《资治通鉴》“愍帝建兴元年”条,第2799页。

敌手。刘琨身后的声名沉浮,与东晋政府对待北方局势的态度密切相关。刘琨身后声名,有一个从下降到上升的变化过程。王浚的身后名誉,却呈现出直线下降的趋势。王浚恶名的由来,主要源自四个方面:一是参与谋杀太子遹的政治活动;二是援引鲜卑突骑对付西晋政府的经历;三是王浚僚佐中没有在江东立足从而表其功劳者;四是有矫制假立太子的僭越事迹。与王浚相比,刘琨在八王之乱的格局中,置身事外;虽有援引拓跋骑兵之例,但主要是针对刘石军团;刘琨幕僚中,颇有在江东建有不世功勋的人物。凡此皆为刘琨名望上升之原因。最堪注意者,刘琨亦有部属劝其称帝的离奇经历^①。发生在王浚、刘琨身上的“称帝传说”,显然根植于“晋少贞臣”的政治环境^②,同时也是北部中国华夏正统消解、民心离散、帝国崩溃的真实写照。一正一反,王浚、刘琨皆以督镇北方,任北面之重,以司马越部属的法统地位自居,却名声各异,值得玩味。

要言之,晋末乱局,北方浇漓,胡汉各种力量出于种种因素面临重组和整合,并幽冀三州的局势变动决定士族家庭的盛衰荣辱、北方地区的社会流动乃至两晋交替的历史进程。三州中的胡人势力以鲜卑、匈奴为最,拓跋、羯族踵其后,尤其在匈奴坐大并州的情况下,太原王氏由于各种机缘,不可避免地出

现分化,其中王浑家族与匈奴族亲近,而王浚家族则依靠鲜卑段部,抵御羯族。平原华氏和王氏一样,不同房支出现不同的政治际遇。王氏、华氏复杂多变的士族生态,是权力争衡下北方士族发展轨迹之缩影。西晋帝国北方问题的累积与爆发,由宗室内乱、政治党争扩大为民族矛盾。胡族崛起,辄有驱除。匈奴之兴,羯族之起,八王之乱的纷繁多杂,王浚、刘琨的惨淡经营,皆为十六国粉墨登场之驱除。北方纷乱时局的历史内容,正是胡汉力量消长变化的真实反映。堪值注意的是,这个转化的过程是曲折复杂的,其复杂性体现在非汉民族如何摆脱华夏帝国传统因素的制约,中原士望如何能够决绝地背弃汉地传统的影响,剥离秦汉以降汉人正统观的“自然属性”,从而走上建立非汉政权的道路,这无疑又是一个耐心寻味的问题。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魏晋南北朝并冀二州士族群体比较研究”(10YJC770024)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周奇)

① 《晋书·刘琨传》,第1681页。

② 《十七史商榷·晋书》,第448—449、467页。

On the Ecology of Great Families and the Situation of You and Ji Prefecture between Western and Eastern Jin dynasties

——Focused on Wang Jun

Fan Zhaofei

Abstract: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saw the factional struggle between Wei and Jin Dynasty, the political attitude of which determined the fluctuation of great families. Wang Jun's family was involved in the struggle. Some members had gone over to the Jia Chong's faction, the others sided against it. *The Epitaph of Hua Fang* provided us important information for understanding of the family network. It was an image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family ecology between Western and Eastern Jin Dynasties. The family network which focused on the prefecture or commandery fell apart. The residents' pattern influenced the force on which Wang Jun depended. Wang Jun used barbarous people of Xianbei and Wuhuan to subjugate their own races of Jie. His force embodi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ies of blood and district.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Wang Jun's and Liu Kun's group, the roles of which probably were faked by the latter historians. From then on, the power balance between Chinese and tribe changed completely.

Key words: during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Jin Dynasties, ecology of great families, situation of You and Ji Prefecture, Wang Jun, Liu Kun